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学术文库

亚洲的发展与变革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Asia

周方治/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助

亚洲的发展与变革

周方治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柏 英

特约编辑:林 昶

装帧设计:边 疆

责任出版:刘林琦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发展与变革/周方治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术文库)

ISBN 978-7-5012-3166-9

I. 亚… II. 周… III. ①政治—研究—亚洲②经济发展—研究—亚洲③国际问题—安全—研究—亚洲 IV.

D73 F130.4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155 号

亚洲的发展与变革

Yazhou de Fazhan yu Biange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http://www.wap1934.com>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照排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 1/4 字数:240 千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166-9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谈到亚洲,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广袤的地理空间,多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亚洲之大,甚至难以用一个整体来描述,一般可分为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而东亚又可分为东北亚、东南亚,每一个区域都很不相同,有着自己的独有的特征。当今的亚洲,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变”。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比斯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亚洲的巨变呢?从总的来说,二战后的亚洲巨变是由以下的重要发展构成:一是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殖民制度的枷锁获得民族独立;二是经济现代化进程加速,具有代表性的,先是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相继腾飞,再是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三是区域合作的发展,由东盟的合作作为先导,现在发展起了多层次、多构架的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合作。奈比斯特指出:“过去的亚洲,曾经被文化、语言、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和地理环境所割裂,而当代亚洲靠经济联系、高科技,特别是发达的通讯和人口流动紧紧铸为一体,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当然,亚洲还仅仅是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距离一个紧密联系与合作的完整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形成完整的地区,首先取决于亚洲各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地区合作与联合的发展。目前,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地区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仍然是亚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或许,一个像欧洲那样的联合起来的完整的亚洲很难实现,但是,亚洲将会继续发生深刻的转变,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加快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会进一步在探求适合自己模式的基础上得到深化。

2 □ 亚洲的发展与变革

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迅速发展已经并且会进一步提升亚洲的地位。中国和印度都曾是历史文明古国,考虑到两国的人口规模、发展速度、市场潜力、地缘重要性和文化影响力,两国的崛起不仅会极大地改变亚洲的面貌,也会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格局。

关注和研究亚洲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当今学术界,而且也是政界、商界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6年设立了关于亚洲发展的课题项目,面向本院国际研究学部的年轻研究人员。该项目由本人主持策划,并由周方冶同志负责具体落实。本书汇集的是部分年轻研究人员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亚洲的区域合作和地区关系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虽然本书在结构上并不连贯,但书中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读者对亚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亚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应该对亚洲研究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更大的支持,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

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亚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2007年2月20日

目 录

序 言	张蕴岭 (1)
-----------	-----------

上 篇 区域合作·地区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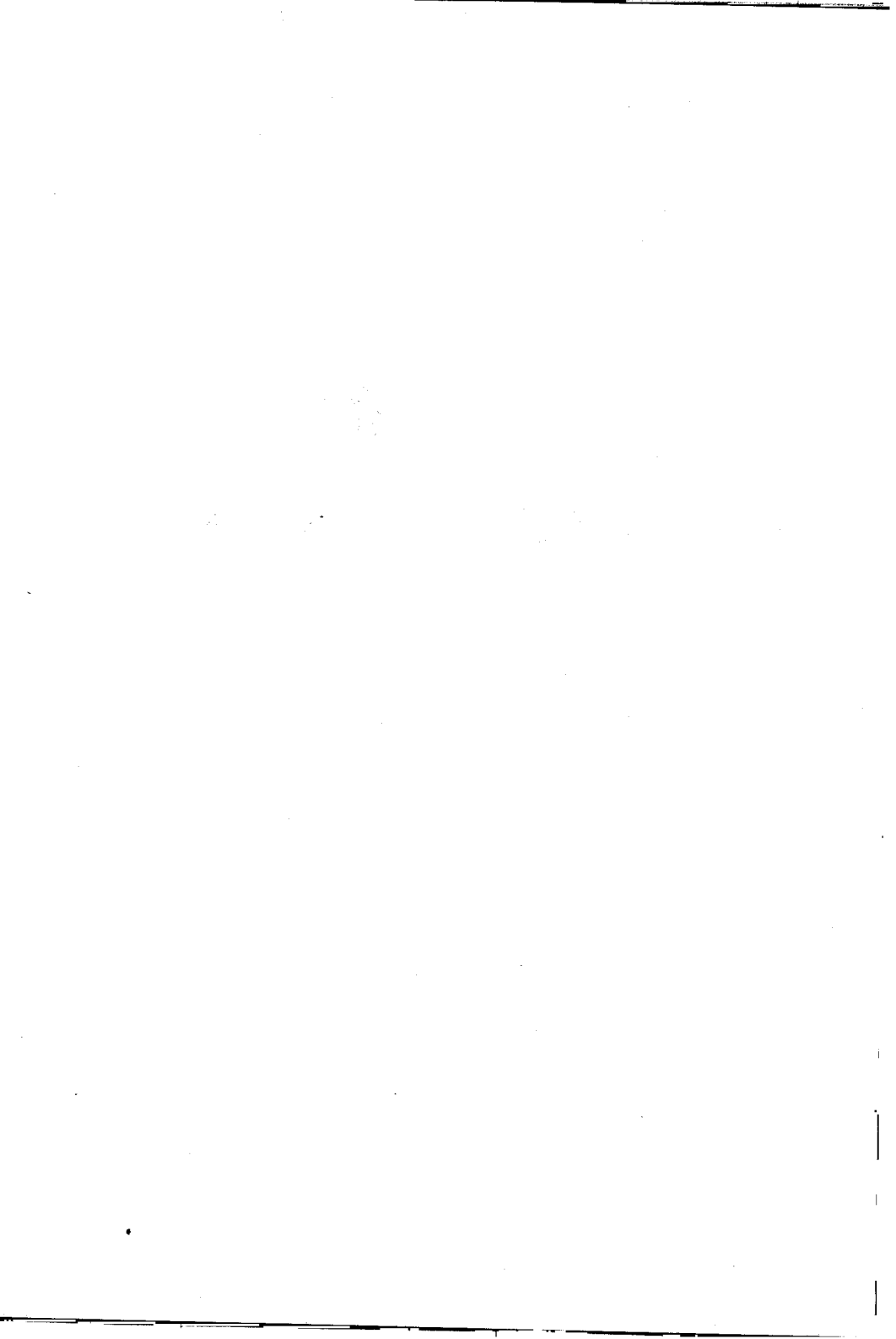
东亚新地区主义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	杨丹志 (3)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贸易	王玉主 (27)
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白如纯 (47)
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俄日关系	李勇惠 (67)
日本经济复苏及其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张季风 (90)

下 篇 政治·社会·文化

泰国他信政治集团的兴衰及其原因	周方冶 (117)
日本修宪与民族保守主义思潮	孙伶伶 (142)
印尼亚齐问题政治和解的原因探析	张 洁 (163)
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嬗变	马学清 (184)
日本危机管理体制演变的实证研究	王德迅 (217)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与政策选择	王 伟 (243)
“韩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马军伟 (263)

上 篇

区域合作·地区关系



东亚新地区主义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

杨丹志*

地区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又是一种实践。具体而言,即“同一地区的各种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区主义的全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并行不悖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在世界范围内,地区主义逐渐形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板块。与欧洲和北美相较,东亚是最具有多样性的地区,同时也是地区主义最不成熟、最缺乏制度化特征的地区。由于东亚地区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安全利益的多样性,特别是冷战时期存在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度认为:东亚地区先天缺乏地区主义和机制化合作的基础。^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得东亚地区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与传统意义上的地区主义存在着诸多差异的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① 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② See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Books, 1991, p. 51.

一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主要特征 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一)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1997 年的市场驱动阶段。

80 年代中期,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开始呈现出日益加强的态势,这种态势是在非制度化安排下自然形成的,体现出市场驱动和市场机制的鲜明特征。雁行模式即为此时期东亚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在此模式中,东亚各国按照要素禀赋和工业技术水平分为三个层次:日本属第一层次,其技术先进,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于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头雁地位。由于日本在过去 30 多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其他东北亚国家和地区被吸引到日本的经济轨道上去不仅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包括中国内地,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包括朝鲜。^① 东亚四小龙属第二层次,技术较为先进,重点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中紧跟日本。中国和绝大多数东盟国家则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见长,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居于第三层次。这一时期,东亚地区逐渐实现了产业梯度的转移。其基本进程是: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前半期,由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移;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由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移至东南亚国家;90 年代初期再经由东南亚国家转移至中国。

这种雁行模式下的产业梯度转移虽然一度促进了以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生产为主的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但从长远看,并不利于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总体上看,雁行模式仍是一

^① 参见[美]罗伯特·A.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未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129 页。

种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确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因袭了传统垂直分工的不合理性,对中国等后发国家也易形成制度性歧视。

这一阶段,东亚国家大多遵循着经济多边主义传统。直到 2001 年底,在世界前 30 位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仍没有缔结任何形式的 RTA。^①

在东亚地区,只有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两个组织开始了经济多边主义之外的尝试。

东盟成立于 1967 年,长期以推进成员国政治、安全合作为主要目的,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涉及经济合作议程,此后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发展缓慢,直到 1992 年才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就相当有限,并且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东盟各成员国自身经济调整和彼此间互动的结果,并不是源于东盟框架之下的区域内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

1989 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遵循的则是“非歧视”原则和“互惠”原则,允许成员采用有条件或无条件方式将亚太经合组织的自由化进程推广至非成员国,并积极致力于推进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亚太经合组织成立近十年间,在推进亚太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乏善可陈。

总体上看,在这一阶段,东亚的地区主义还处于起步时期。

2. 1997 年至 2001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泛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衰退。危机中,不仅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应对乏力,而且在许多东亚国家看来,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补救措施反而延长和加剧了经济的混乱。因此,需要创立一个新机制来促进东亚合作。不过,马哈蒂尔在 1990 年提出的建立“东亚经济合作核心”的倡议,对许多东亚国家而言又难以快速付诸实施,因为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集

^① 参见杨权:《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解释》,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13 页。

团,在短期之内是不现实的。在东亚国家看来,要推进东亚经济合作,首先要建立政府间的协调实体。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区域内国家强烈意识到开展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各国学界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设想,“10+3”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区域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

2000年5月在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同时,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①

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现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势头。

3. 2002年至今的制度化发展阶段。

在此进程中,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已被纳入一个拓展中的相互依存网络之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发生改变,更加开放的中国开始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多边自由贸易进程中,中国推进合作的意愿日益增强。同时,中国的出口市场也日益扩大。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东亚新地区主义,特别是正式的制度化安排的加速发展。

正在发展的东亚新地区主义呈现出“10”、“3”、“10+3”、“10+1”、“10+3+3”等五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存的局面。

(1)“10”即东盟十国建立统一的地区共同市场。在2003年第九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文件,决定在2020年将东盟建成以商品、服务、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

^① 参见杨权:《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解释》,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第14页。

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进一步推进东盟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强东盟内部的凝聚力。

(2)“3”即中、日、韩三国合作。在1999年东盟十国与中、日、韩首脑早餐会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倡议。2000年东盟十国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首脑首肯了此构想。2002年11月的第三次“10+3”会议上,各方就适时启动中、日、韩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但是,由于三国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缺乏战略和谐,加之近年来中日、韩日关系齟齬不断,中、日、韩三国合作迟迟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3)“10+3”与“10+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寻求中、日、韩三国的帮助。各方都强调在发展预防性能力、避免金融危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10+3”机制应运而生,东亚合作也由此显现出金融先行的势头。“10+1”机制的建立是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关系深化发展的表征。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将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0+1”机制也由此得以迅速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发展,带动日本和韩国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

(4)“10+3+3”即以东亚峰会为标志的东亚合作新模式。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在地缘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获得参会资格,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在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东亚峰会还只是一个论坛,尚未成为机制,但正如温家宝总理在首届东亚峰会上所言,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发展之客观要求,是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

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 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正式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从而向外界表明,东亚峰会的参与各方已朝着深化区域合作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关于新地区主义的概念迄今为止尚无明确的界定,但作为一种有别于旧地区主义的实践,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存在和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2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亚新地区主义显现出以下特征。

1. 明显的开放性。

在世界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欧洲和北美的地区主义被称为是内向型的地区主义(inward regionalism),在经济领域具有保护主义的特征。而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主义被称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内向型的地区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之区别,就在于前者对区域外国家和地区存在歧视,而后者则没有这种歧视。^② 诚如卡赞斯坦所言,亚洲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非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并且愿意接受新成员。这与欧洲和北美封闭的区域主义相异。^③ 目前,整个东亚距离单一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尚远,但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在自身发展远不够充分的情形下,仍然体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2005年12月举行的首次东亚峰会,虽然未能提出指导东亚合作的

^① 参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首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5日。

^② See Glenn Hook, "Japan and Contested Regionalism", in Ian G. Cook, Marcus A. Doel and Rex Li, eds., *Fragmented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in Pacific Asia*, Avebur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p. 13.

^③ See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1, pp. 1-44.

任何具体措施,但会议的举行本身就已经发出了东亚合作将拓展到其他区域(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信号。亚欧会议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举行,同样也加强了东亚与其他地区间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恰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基本态势相适应,这是以往的区域合作所难以企及的。

2. 行为主体的多元性。

冷战时期,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基本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即使是作为地区主义发展样板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概莫能外。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深化并行不悖,其主体不仅是主权国家,还包括众多非国家行为体,诸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运动甚至个人。目前,东亚新地区主义已经显现为由国家引导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由外部强加的,诸如世贸组织等国际机制施加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地区化进程和由市场及私营部门驱动的自下而上的地区化进程的结合与互动。

3. 自发形成而非外力所致。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类地区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超级大国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东亚新地区主义则是从区域内部自发产生的。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且至今仍未终结的全球财富转移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权势结构变迁的进程中,绝大多数民族国家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应对新的挑战。正是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争取维护和实现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进程中,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地区归属感或者是地区认同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了合作的共同意愿和需求。这种共同意愿和需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深层驱动力。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地区合作架构应由多国共同构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成为区域内的霸权。^①

^① See Bernard K. Gordon, "A U. S Policy for Asia in the 1980s", in Charles E. Morrison, ed., *Threats to Security in East Asia-Pacific: Nation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Lexington Books, 1983, chap. 15, p. 204.

4. 明显的弱机制性。

20 世纪 80 年代,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北亚经济合作时指出,东北亚地区是一种软地区主义,即没有一种成形的制度或是机制来引导的区域合作。^① 实际上,迄今为止,东亚新地区主义仍然没有一种成形的机制作为载体。卡赞斯坦指出,亚洲区域合作之所以体现弱机制化,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二战后,美国推进了亚洲的双边主义,而在欧洲推进了多边主义;其次,集体认同的确立推进了正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而亚洲主要的政治行为体不接受建立区域共同体的理念;再次,亚洲国家的特性阻碍了区域机制的建立。亚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对公私领域的关注使其与欧洲国家区分开来,因而不愿发展正式的区域机制。^② 在亚洲,区域贸易安排之所以缺失,部分原因就在于区域内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相对而言,弱国较为反对过早建立正式的地区机制,担心这种机制只反映和维护霸权国的利益,会损害弱国的安全。因此,机制的建设进程必须遵循使各方感到“舒适”的原则。

5. 目标和领域的多重性。

传统地区主义的目标相对单一,通常主要关注安全或经济问题,而新地区主义则是更为复杂和多维的进程,广泛涉及贸易、经济、国家安全、环境及社会发展等内容。

6. 跨越南北关系的鸿沟。

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了区域合作,这表明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地区内国家的相互依存正在日益增强。

7. 以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推进地区主义发展的机制。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合作方式超出了传统贸易自由化的范畴,各

^① 参见[美]罗伯特·A.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未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129 页。

^② See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44.

国通常会优先考虑与少数具有共同意愿的国家展开合作,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建立一个成员众多的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在东亚地区,现实情况是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安排首先确立且在空间上同时并存。实际上,这些双边协定和双边机制的现实存在,有助于消除国家间既有的分歧,也为一系列多边关系和多边机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国家间互动频繁的复杂的区域网络。

(三)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地区安全

1. 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及地区安全动力的新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多极化进程,一个新的多极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对霸权的牵制也相应增强。与此同时,地区内国家由原先安全的消极接受者变为积极参与者。^①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以中国的兴起为重要表征的东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新态势。在东亚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日本也积极推行新的东亚地区战略。中日大竞技的轮廓已经浮现;东盟在“扩容”后也更为积极地参与了东亚事务;韩国也不甘落后,自卢武铉担任总统后,开始打造“自主国防”,宣称要做“东北亚的均衡者”。总体上看,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正处于调整变化时期。

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所提及的和平三要素——民主、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对于构建东亚和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东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分裂要大于地缘经济的分裂,经济区域化和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中日以及台海爆发刚性冲突的危险。如果各方均认为通过推进地区合作来获取收益远大于竞争和对抗之所得,并积极开展相应的合作,无疑将验证戴维·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观点:通

^① 参见桑晓旻、郭延军:《新地区主义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9期,第84页。